

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斷推向前進

議事論事 子言

今年國慶節，可以說是近幾年氣氛最濃厚、活動最豐富、各界參與度最高的一年，香港處處都洋溢着一份特別的驕傲和自豪。這份驕傲和自豪源自於何？國務院港澳辦徵信公眾號前日發表「港澳平」文章指出，這是作為祖國大家庭成員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與有榮焉，也是作為直接參與者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新中國光輝歷程增添一篇華彩樂章的與有榮焉。事實上，「一國兩制」事業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成功實踐是中國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在當前大步邁向由治及興的新發展階段，港人要更加團結一心、更加奮發努力，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斷推向前進，贏得更大的驕傲和自豪。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不是一帆風順的，更不是理所當然的，當中既飽含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高度關心和重視，對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大局中的深思熟慮和

長遠謀劃，更體現了「一國兩制」本身制度的優越性和先先進。「港澳平」文章對此作了深入深刻的分析。

首先，「一國兩制」事業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事實上，「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什麼「權宜之計」，而是一項基本的國策。中央始終把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央處理港澳事務，從來都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從來都以國家和港澳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正因為將「一國兩制」放置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儘管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種種困難和挑戰，但最終依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回歸祖國27年來，香港很多東西沒有變，但也有很多東西變了。不變的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各種制度，變的則是競爭優勢更強、發展空間更廣闊。

例如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對外投資最大目的地；香港是全球最

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也是內地資本進行全球化投融資和風險管理的最佳平台，等等。從中，可具體而深入地感知「一國兩制」下香港在國家發展全局中扮演的獨特重要角色。試問，如果不是中央堅定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堅定支持香港發揮優勢拓展聯繫、堅定支持維護香港的利益，上述優勢又豈會成為現實？

其次，「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是中國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這在歷史上並不多見；而以一種制度方式達至和平統一，更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還從未有過。可以說，「一國兩制」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體現了求同存異、共謀發展的中國氣派，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是中國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既然是創舉，就意味着沒有先例可循和現成經驗借鑒，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中央帶領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積極探索前進，全力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一段時間以來，外國勢力及反中亂港分子不斷對香港採取各種抹黑、恐嚇與制裁，意圖破壞「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打亂香港的發展進步。事實證明這些都是徒勞的。

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保持港澳獨特地位和優勢。中央並根據實際，推出了包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一系列重大惠港挺港舉措，使種種「不可能」變為「可能」，使「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不斷顯現。

最後，香港要團結一心奮發努力為國家貢獻更大力量。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

港如今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不斷得到鞏固提高。最新數據顯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重回前三，航運高增值服務日益增強，面向全球的經貿網絡不斷拓展，香港國際機場貨運量全球第一。

近期香港受惠內地金融「組合拳」，股市連日大漲，環球資金大舉入場，一些曾「唱衰」香港的金融機構，如今紛紛「轉軌」看好香港未來。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就在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擁有的無可取代的優勢，經受得了各種挑戰。

當然，發展不能被動而為，要有主動進取的精神。我們為香港「一國兩制」成就而感到振奮，更要在未來展現更大作為。如今在新時代新征程中，香港迎來的機遇更多、空間更廣闊，關鍵是要主動作為的態度。正如「港澳平」指出，香港社會要更加團結一心、更加奮發努力，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斷推向前進，以共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更大作為和貢獻。

「立場案」判決說明 守住底線的新聞才能自由

以法論事 顧敏康

前不久，法庭裁定已停運《立場新聞》的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理總編輯林紹桐「串謀發布及複製煽動刊物」罪罪成。案件於9月26日宣布判刑：鍾沛權判囚21個月，林紹桐獲釋，《立場》母公司則罰款5000元。

本案是香港回歸後首次有傳媒公司與傳媒工作者構成煽動罪，因此也格外引人關注。外國勢力當然會攻擊與抹黑，這個是在預料中的。而記協也毫無根據地聲稱案件反映新聞自由衰落，造成不可逆轉傷害云云。其實，記協才是更需要通過此案件反省的。香港過去一味強調所謂「新聞和言論自由」，很少有人談限制或底線，即使出格過界，也好像沒有什麼重大後果。現在有了案例，劃出了紅線，所以才有人覺得反差太大，認為新聞自由被限制了。新聞自由相當重要，基本法將其作為基本權利給予保障，但新聞自由從來就不是絕對的，不能損害國家安全及破壞社會秩序，是有底線的，這就是「立場新聞案」清楚帶出的信息。

將平台變成危害國安工具

首先，新聞自由意味著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士是有特殊責任的。1996年9月，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制定了新聞記者的職業倫理規範，其核心就是追求真實並加以報道。相信香港的新聞工作者都熟悉這個倫理規範。本案中，法官認為新聞工作者都知道「新聞工作的首要責任是講真話，不是講假話，不是講半真半假的話」，

當發布者盡力查證事實，自然有客觀基礎。可惜一些新聞工作者只顧政治立場，忘記了真正的責任。

其次，香港的煽動罪原屬於《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罪行，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由港英政府頒布的《煽動刊物條例》，1938年港英政府訂立《煽動條例》，於1970年代才納入《刑事罪行條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取代了《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第10條，並把「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發表具煽動意圖的文字或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複製或輸入該刊物」訂為煽動罪。這個是成文法律，相信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士也知道這樣的法律規定。只不過香港回歸後幾乎沒有執法，再加上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誤導說這是古老法律，違反人權法云云，一些新聞媒體人不當回事而已。本案中法官也一針見血指出，煽動罪自1938年起是成文法罪行，為傳媒工作者提供指引；即使回歸後沒涉及傳媒的案例，傳媒仍可參考歐洲人權法庭案例。所以，想以「不知法」為藉口推卸責任是站不住腳的。

本案中，可以看到法官對兩個被告人的描述：兩人非單純新聞工作者而是「參與抗爭者」，罪行相當嚴重。這說明了兩被告人已經不是履行新聞職責，而是站在「抗爭者」一方與政府抗衡，而將《立場新聞》變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或者說以新聞自由作為「擋箭牌」去實施損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屬於明知故犯。

誠如法官裁定，《立場新聞》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義」，2020年至

2021年間發布11篇煽動文章，成為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

本案的判刑也是令人關注的。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最高囚2年。對於審批發布大部分文章的鍾沛權，郭官採納23個月量刑起點，因審訊壓力減刑兩個月，判囚21個月。至於林紹桐的判刑，法官以14個月為量刑起點，並因應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減刑，讓他不需即時入獄。這一方面表明了兩人罪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區別對待。當然，今後若犯煽動罪，判刑會更加重，因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的煽動罪最高刑期為7年。

客觀持平報道評論不會違法

「立場新聞案」引出的教訓是深刻的，希望新聞工作者能夠平衡好新聞報道與遵守法律底線的關係。客觀持平的新聞報道或評論才不會逾越紅線。前不久，記協聲稱有數十名記者近月受不同滋擾及恐嚇。事隔近兩周後，記協主席向會員表示，得悉警方已接觸最少兩名報案人跟進案件，私隱專員公署亦將部分投訴轉介警方跟進。這就足以證明，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和關注保障香港的新聞自由。記協主席亦指出多名官員表明不接受滋擾恐嚇的行為後，相關情況「似乎全然停止」，「在香港法治和保安官員的威嚴下，歹徒仍然有所忌憚，不至於公然繼續其惡劣行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不論任何背景立場，如果任何人受到騷擾或威脅，執法部門都必然會公正處理。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湖北社團總會顧問

將大灣區發展成國際「美食角」

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5周年華誕，全港市民也與內地同胞一樣同慶同樂，為國



有話要說
張宇人

性，在區域合作下，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美食角」。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香港「三個中心一個高地」戰略定位，即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自由黨亦致力在這些方面努力，希望以香港優勢助力國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以國際航運中心發展為例，自由黨去年向行政長官提出「綠色海港」計劃，建議政府在港口設立可提供包括綠色甲醇等潔淨能源加注服務，從而吸引外國貨輪來港卸貨，本地船隻亦可以受惠。特區政府去年12月公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支持香港海運及港口業持續發展，特別是加快香港高增值航運服務集群的發展，提升業界的長遠競爭力。有意見估算，內地港口對可用作航油的綠色甲醇需求量，將由明年30萬噸增至2030年的120萬噸。自由黨認為，特區政府要加快腳步，因為船公司必須按照歐盟碳排放標準來計劃航線，若深圳鹽田或蛇口設有綠色甲醇加注服務，遠洋貨輪或許會選擇到內地港口卸貨，到時香港的航運物流業都會受影響。

首先談談筆者所在的香港飲食業界。內地高度重視「健全糧食和食物節約長效機制」，維護糧食安全，遏制「舌尖上的浪費」。除了「少飯」選項，香港食肆不妨參考內地一些食肆的做法，讓食客點菜時可以選擇「半份」。食肆也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等創新科技，更精準地評估每日每種食材所需分量，再從管理層面優化進貨數目。至於進貨渠道，內地有不少物美價廉及有特色的食材可供香港食肆採購。這些方法不但節省成本，更能夠避免不必要的糧食浪費。

香港一直有「美食天堂」美譽，從地道小吃到米芝蓮三星餐廳 fine dining，各類美食應有盡有。在世界口地人員來往密切的今天，香港要鞏固「美食天堂」聲譽，不能故步自封，要思考如何吸引旅客和留住本地市民。其中在內地城市設立分店，是香港飲食業其中一個發展新方向。一方面，設立分店有助香港建立國際品牌形象，展現香港特色，擴大目標客群；另一方面又可以到競爭激烈的內地城市與其中的佼佼者形成良性競爭，學習他們的銷售手法和待客之道。我們也歡迎內地餐飲品牌進駐香港，進一步豐富香港的餐飲類型多樣

性，在區域合作下，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美食角」。

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香港「三個中心一個高地」戰略定位，即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自由黨亦致力在這些方面努力，希望以香港優勢助力國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以國際航運中心發展為例，自由黨去年向行政長官提出「綠色海港」計劃，建議政府在港口設立可提供包括綠色甲醇等潔淨能源加注服務，從而吸引外國貨輪來港卸貨，本地船隻亦可以受惠。特區政府去年12月公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支持香港海運及港口業持續發展，特別是加快香港高增值航運服務集群的發展，提升業界的長遠競爭力。有意見估算，內地港口對可用作航油的綠色甲醇需求量，將由明年30萬噸增至2030年的120萬噸。自由黨認為，特區政府要加快腳步，因為船公司必須按照歐盟碳排放標準來計劃航線，若深圳鹽田或蛇口設有綠色甲醇加注服務，遠洋貨輪或許會選擇到內地港口卸貨，到時香港的航運物流業都會受影響。

教育方面，自由黨認為香港同樣可以擔當重要角色，成為協助內地學府邁向國際化的平台。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有多間大學躋身全球一百間名牌大學之列，足證香港在這方面的實力。自由黨早前立法會一項相關的動議辯論中，建議特區政府可採取較進取的做法把香港建設成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在吸引更多海內外學生來港升學，進一步發展香港的教育產業，同時打造本地人才庫。自由黨深信，只要香港保持國際化的特色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好好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帶來的重大機遇，香港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必將大有可為，香港特區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香港應如何打造人工智能「政策競爭力」

法政新思 鄧凱

為更好地因應科技趨勢，提升香港的數字競爭力，特區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以下簡稱「數字辦」）於7月25日正式成立。數字辦由原有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效率促進辦公室合併改組而成，這意味著新架構首先將承襲前身的舊有職能，如部署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設，以及推動各行政部門應用先進數字科技等。在此之外，數字辦還通過增設「數字基建」的新板塊來補強其肩負促進本地產業發展及深化與內地數據合作等的「發展」角色。

數字辦職能的有效訂明，無疑為未來香港數字政策的設計走向、數字治理的方法選擇提供合理預期，更視為助益香港贏取產業競爭制高點的重要組織法保障，畢竟科技競爭的背後往往是治理創新力與政策支撐力的角逐。着眼於大模型這一重大技術躍升，本文嘗試就如何打造人工智能「政策競爭力」做簡要闡釋，其中包括比較論述他域經驗之優劣，並寄望於數字辦的成立能帶動提速制度創新，加快響應技

術發展新需求，從而令香港獲得競爭先機。

一、敏捷治理是政策競爭力的必備簡要概括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特徵包括：智能性和自主性較傳統自動化而言顯著較強；因技術複雜且迭代迅速而帶來關於透明度和可解釋性的巨大挑戰；應用速度快、影響範圍（行業）廣，被譽為又一次工業革命等。面對新情勢，植根於傳統行政體制的舊治理機制似乎成效有限，其掣肘主要表現在：第一，監管者的技術能力在客觀上落後於被監管對象；第二，政府監管靈活性不足使其難以應付以快制勝的技術及商業模式；第三，如若搬運傳統方法，貿然由多個職能部門聯手參與新技術治理，或極易因協調不暢造成監管層層加碼，甚至是政策的「合成謬誤」現象。

「敏捷治理」即於上述背景下誕出。作為一種更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工具，敏捷治理之概念首先源自數字企業的產品創新實踐，後來則被借鑒到關涉數字技術的公共政策領域，並逐步成為全球共識性理念。聯合國在今年9月通過的《全球數字契約》中，提出對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

術實行敏捷治理；年10月，內地發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明確主張「實施敏捷治理，分級分類管理，快速有效響應」。究其核心思想，敏捷治理試圖透過「快速反應」和「利益攸關者」參與這兩種進路來應對前沿科技的不確定性，進而更好地實現技術在創新與安全之間的平衡。

之於前者即快速反應，設立一個專責機構以統籌人工智能的戰略執行工作，重要性毋庸置疑。專門部門的權責統一與精準施策不僅有助於增強宏觀戰略和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更可避免總體目標失衡。關於允許利益攸關者參與治理的基本邏輯，則建基於各類創新主體對技術趨勢和利益轉化更為敏銳，既有內在動力又有技術能力，較容易做出敏捷反應，快速找到平衡各方訴求、化解衝突的解決方案。相應地，來自行政方面的監管作需適度謙抑，如若政府必須行使法定職權做干預，則盡量採用軟法治理，以增強規則的韌性與適應性。

二、全球主流治理經驗值得研究關注總體來看，敏捷治理不是簡單地利用某種數字技術工具單方面提高行政監管部

門的響應速度，而是治理方式的全面創新。諸如上下結合、對話參與、軟法規制、注重結果等貫穿於其中的方法運用及價值取態，無不代表著敏捷治理溢出傳統監管的範式轉型。這方面，美國在人工智能系列制度實踐有不少值得參考之處。

首先在戰略執行方面，設立「科技政策辦公室」以代表總統專責統籌協調人工智能創新合作。其下屬的「人工智能倡議辦公室」則負責具體實施，作為聯邦政府協調人工智能戰略的中心樞紐，推動政策文件制定、監督實施，尤其是對政府預算提出意見並落實。聯邦政府各部門對應也設立有各類專門機構，包括「人工智能諮詢委員會」、「研究資源工作組」、「機構間委員會」等。從利益攸關者參與的角度上看，上述決策諮詢機構還擅長評估與「檢討」，通過充分吸收政府、學術界和私營部門意見，形塑「戰略制定—評估改進」的正向循環。

除卻專門性的組織架構外，敏捷治理還表現在幾乎沒有新設強制性的行政監管。即便早前的總統令採取集中式的框架，且

奉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信」為圭臬，但「促進創新」仍是價值優先，其考量不僅在於「確保在技術發展前景和風險管理方面保持領先」，更暗含基本假設如下：人工智能反映構建者和使用者的原則，政府相信社會的樸素理想和民間的無限創造力。

一方面，其制式的技術治理以積極採用指南和指導類軟性規則為主，即便是強制性措施，也是在事中事後階段要求企業報告關鍵信息，以及政府從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創設首席數據官安全審查制度等角度推動敏捷治理秩序完善。另一方面，這些美國大型人工智能企業的具體實踐，不論是從內部公司治理到外部市場競爭，也的確展現出較好的集體理性和負責任的承諾遵守，既給予監管的實責信賴以正向反饋，又借利益攸關者之獨有實踐反向促成了敏捷治理新生態的塑造。敏捷治理內的良性循環也就此生成。

（上）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與人權論壇研究員、法學博士